

南开史学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1
1980

编 者 的 话

为了在新长征的历史时期更深刻正确地了解和认识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提高我校历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有益的研究成果，我们创办了《南开史学》。

《南开史学》暂为不定期刊物。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

《南开史学》还是一株刚出土的幼苗，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或缺点，我们希望南开大学师生、国内外的南开校友和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把它当做自己的园地，关心它、抚育它，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它在社会主义的百花园中茁壮成长！

目 录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	周恩来	1
关于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初探·····	魏宏运	10
重评古田会议·····	左志远	18
清代的幕府·····	郑天挺	25
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初探·····	冯尔康	63
关于明代天津水田·····	郑克晟	91
略论明代军屯士卒的身份和军屯的作用·····	汤纲 南炳文	108
明清的寺田·····	傅贵九	127
读满文《满州实录》札记·····	王文郁	153
孟子——中国封建制童年时代杰出的 社会思想家·····	曹智英	191
马克思恩格斯论十九世纪中叶后英国工人运动的 衰落·····	刘克华	222
浅谈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	张友伦 李节传	245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国主义裁军·····	林和坤	260
略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形成·····	张义德	283
浅谈明治时期日本农业稳定发展的几点经验 ·····	王家骅 武安隆	301
关于匈奴史的中国史料·····	陈序经遗著	321

Contents

- Religious Spirit and Communism..... by Chou Enlai(1)
An Initial Inquiry o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a
in the Thought of Chou Enlai.....by Wei Hongyun (10)
A Reappraisal of the "Gutian Conference"
..... by Zuo Zhiyuan(18)
- The Mufu or Private Bureaucracy in the
Qing Dynasty..... by Zheng Tianting(2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oney Rent and the Status of
Peasantry in the Qing Dynasty.....by Feng Erkang(63)
The Paddy Fields in Tianji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by Zheng Kesheng(91)
On the Soldier-Farmers' Statu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Garrison Army Reclamation Farms of the Ming
Dynasty by Tang Kang and Nan Bingwen(108)
The Temple Farmlands in the Tim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Fu Guijiu(127)
Notes Taken at Reading the Original *Manzhou Shilu*
(Manchus Chronicles) by Wang Wenyu(153)
Mencius—the Brilliant Social Thinker of Chinese
Feudalism in Its Childhood by Cao Zhiying(191)
- K. Marx and F. Engels on the Decline of the Workers'

-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after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by Liu Kehua(222)
-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by Zhang Youlun and Li Jiechuan (245)
- The Disarmament of Imperialist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wo World Wars.....by Lin Hekun(260)
- On the shaping of the Unified Russian State by Zhang Yide(283)
- Concerning Some Experiences of the Steady Growth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During Meiji Time by Wang Jiahua and Wu Anlong (301)
-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Relevant to the History of Huns—
 A Posthumous Manuscript of Late
 Professor Chen Xujin (321)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

周恩来*

新近旅法学界中有些人集资编印了一种非宗教的册子，名《无所谓宗教》。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当做的事。在那本册子中，“如何掘去宗教之根”一文，要算是杰出之作，只可惜文中最后一段竟以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殊令人大惑不解，且适足为全篇根据科学精神反对宗教的污点。著者曾谓“吾人不能于物质世间之外，复有非物质世间。”“……吾们的人生，是实际的人生。”“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这是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的问题，应让社会改革者去解决。”总此数语已知著者是接近唯物史观的了。著者信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然则科学精神又如何？著者说，“……种种社会上问题，我们发现了他的不安，我们便立当研究一个改革的办法，有了办法，我们立当去实验过了，

* 发表时原署名伍豪

如果有错，我们也可拿以再去更改，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

“我们只有去究研，去试验，终可以试验出一个最良最适的制度。除了我们不去试验，不肯改革，则终身困苦……”

我们试问问著者，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有一点不合于上边列举的话么？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间”的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而生产力的变迁，更足以使此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另一方更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争斗的痕迹，知道现今的“下层阶级”（凡加“ ”符号的字句，都是用著者语）乃是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欲“削除痛苦的根源”，消灭此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趋向，自不得不想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至于革命，更是“削除痛苦”的不可避免的方法。除非我们抱无抵抗主义，“求上帝无形之安慰”，“不去试验，不肯改革”便罢；否则欲用一个研究出的办法去实验，没有不妨碍旧办法的，没有不与他冲突的。

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唯独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倚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却深恶痛绝。国际共产党因此认宗教是人类中一种毒药。

至著者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我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岂也受了罗素谓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的暗示么？其实罗素所指多在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本来革命精神多出之热烈的情感，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这种培植情感使趋重“实际”的精神，不但改革社会需要他，便实验室中也不可离他须臾。牛顿没有他，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没有他，相对论不会出世。在我们现在看来，牛顿有些地方的精神未免白用，但是安斯坦以前二百年的科学世界，果是谁的领域？且当其时，即至现在，又谁能说他是迷信？

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参加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

与“信仰”之别（其实只说一“信”字便足）。再申说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超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准此，我们能说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么？

共产党人对于他种为有产阶级作辩护，或是无形中阻人前进，引入空想未来天国的种种学说，“不能接受，不能容忍”，而更加上合乎“实际”的批评，这正因他有信仰主义的热烈精神和改革社会的决心。他决不能学自由论者之徒尚空想，还以为是乃本诸科学精神。为要解决物理学上的问题，所以牛顿，安斯坦各信他们的发见为“不易之良方”，为要“削除社会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才信“共产主义为不易之良方”。假若我们对于马克思本着科学精神研究出来，急待试验的共产主义，信而又疑，不去实行，我们又何必谈“信仰”，又何必谈“试验”，谈“改革”。相信安斯坦学说的人，才肯替他证明日蚀的移动是合于他的理论，替他奏此凯旋。那么，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凡是相信某种人的学说，对于其著作，无有不珍视之理，何况急待试验的学说，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议。

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著者止知俄党爱护好的首领，也知各国共产党人时时驱逐其不良的首领么？即在俄国当日，此类事亦极多。

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

著者对于《资本论》亦曾读过未？不知其从何而证明“《资本论》所搜集之事实，即以最有力的暗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因为《资本论》搜集的“事实”（注意此两字），甚有伤“上层阶级”的体面，多是些残暴掠夺的罪状，遂谓马克思藉此与人以暗示。马克思本此以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下层阶级”当将握特权的“上层阶级”赶走，好消灭阶级界限，此不仅暗示，马克思且曾彰明较著地嚷出来了。但著者如此说法，不惧犯有拥护有产阶级的嫌疑么？然则又何解于“剷除痛苦的病根”与“生活颠因为物质世间之缺憾”之言？若以宣布一种阶级一派人的罪恶便以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

野心”，则《无所谓宗教》一书也具有宗教精神作用了。

至其谓“驱下层阶级以杀上层阶级，率共产教徒以制服异己……”。我们第一须认清在共产主义中所认定的“上层阶级”与“异己”果属何人？共产党人指导劳动阶级驱逐有产阶级和附属他的军阀官僚，更使之由有产化为无产来尽人人劳动的义务。这种解脱人类全体，引人向善，并使之有路可走的精神，岂轻轻可以“报复争权”等字样抹杀掉的么？至于杀与不杀，那纯视反革命的举动如何为定。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除非著者与读者是抱无抵抗主义的人，尚可以“杀”字动人，然而又何解于“消灭此不平的政治组织”与“削除痛苦的根源”之说，且更何解于“科学的精神”？

强他人迷信其教条，故基督教说爱之结果为杀。共产党人不仅不说那“爱仇如友”的空话，且也未尝“强他人同其信仰”。反过来，恐怕那有产阶级却正在利用宗教精神使人人麻痹于“自由思想”好听的名辞之中，无形中却为旧制度作了保证而不自觉呢！然则“十字军之东征”“左手执《克兰经》右手执刀”的譬喻，也止有放在“上层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异己”身上为当了。

至于说到“得势”的赤俄，则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

政，而更使指导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人充当先驱，乃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有何足怪！若谓“以首领之意旨，强迫人民服从，”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须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再“人民”果何所指？若谓赤俄首领为拥护无产阶级利益起见强迫反革命派的人服从，有类于罗马教皇，立意未免滑稽。著者试沉心想，今日世界除赤俄外，果是何种阶级的天下？我们果受了何人的强迫而须得服从？且所已得的自由又是什么？不要说实行反抗旧制度，反抗“上层阶级”了，便是为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而有所结合，有所主张，也要常常受那维持特权阶级的法律干涉，而社会上受了宗教精神之毒的人不一定是教徒，更要轻蔑排斥你到了万分，并且有生以来便无形中受了各方教育的限制与暗示。试问自由在那里，自由思想更从何说起？旧制度旧思想既然把人心锢蔽得这样，一旦无产阶级为解放人类全体，而夺得政权，在过渡时期中为要肃清旧毒，扶持自由的新芽，对他如何能不加以限制？不然，还得请出“沙”，请出

克伦斯基政府来好了。但又何必“改革”，又何必“实验”？又何必“实现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以图“消除痛苦的根源”，而得到未来真正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呢？

著者自信为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了，但他文中这最后一段话，实太不科学的了，太不肯跳出旧思想的圈套中来自由思想了。

著者立论着眼在“掘去宗教之根”，但此“根”隐伏之所决非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凡是那描写出一个理想的天国，而无法实现的一切学说主义，都还有宗教迷信的毒根在内，即著者“成功即在目前”之言也都含有几分心理上不科学的宗教毒质在内，想又为著者所忽略了。凡真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人，也都有责任去纠正他！

——原载《少年》第二号（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主办的理论性月刊《少年》第二号上。当时，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散布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的谬论，我国旅法学界中也有一个人编印了一本名为《无所谓宗教》的册子，把共

产主义与宗教同列。年仅二十四岁的周恩来同志不畏权威，勇敢地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写了这篇文章，深刻地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文章阐述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辉！在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开始新长征的时候，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从思想上拨乱反正，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和鉴别是非的能力；对于建设和发展我们马列主义的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介绍此文供同志们学习研究。

（南开大学 周恩来研究室供稿）

关于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初探

魏宏运

周恩来的思想发展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经历了五四运动时期革命的大变化而最后确定下来的。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的救治中国良方，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到了五四运动，共产主义思想之花才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开放，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把它作为自己的信条。中国社会这种新因素的出现，是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紧密联系着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了政治舞台，工人阶级要成为历史的主人，必然的产生相应的理论需求，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就被传播并接受过来。周恩来就是这时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

周恩来是严肃的忠实于自己思想转变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他在给小山的信中叙述了他思想的飞跃：“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以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至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诚挚纯朴的语言，表达了他喜悦的心情和对同志无比的信赖。他坦率的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在这以前他还没有完全无保留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表明他面临着抉

择时激动、欣幸，无限信仰而又唯恐有丝毫偏差的复杂、紧张心情，因为他“求真”的心极盛。他是经过亲身去“推求比较”才下定决心的。这使人们看到一个政治思想家在前进中是如何的艰难困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何等的严肃与认真，人云亦云对他来说是毫无关联的，一切违反科学的学说和理论在他面前都失掉了它的侵蚀能力，人们清楚地看见周恩来对于自己的信仰没有半点马虎。人们都知道，还在日本留学时，周恩来已经赞成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炮火强烈的震动和吸引着他，因为从十月革命他“见到一点光明”

“愈见姣妍”，他欢呼“廿年华识真理”。他接触马克思主义，读了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介绍，但他从未标榜过自己是马克思的信徒。五四运动中，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为难友们系统的讲述马克思主义，狱中书籍资料的条件可以想见。因此不难想象，当时的周恩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已有系统的学习和理解，随后，他又主动的接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他周围一些思想进步的好友，也给他以帮助，还有客观上种种时事给他的教育，启发都是很丰富的。他在《伍的誓词》中曾说到：“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为最大。”去法国之前，他已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以及《十月革命》等书的中译本，但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他才宣称自己坚信马克思主义，愿意终身奉之而行。由此可知，在欧洲对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和“求真”的阶段是他思想升华的重要关键。

到欧洲之初，他虽然已明显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学说，但

仍着意观察研究各国历史和社会实际，虚心考查，以寻求更适合于我国家民族的良策。他在一封信中说：“弟（自称）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主，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谋学所敢认定者也。”当时的欧洲，也和中国国内一样，各种主义学说都登台表演，五花八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有的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这不能不对一些人产生迷惑作用。救治中国，究竟以什么主义为武器呢？这不能单单从书本上和资料中去获得，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独立的思考和足够的理论勇气去选择。周恩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贪婪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考察法、德、英诸国状况，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在此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问题，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不容否认，完成这一光辉历程，道路是曲折的，如一九二一年初，英国的道路就曾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也曾把俄国革命和英国改革作过对比，认为英国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之改革。俄国的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我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究竟采取那一种道路，是很费思索的，他还兴致勃勃地，把自己所得与国内同志相互琢磨：“出国后得了施山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探求的兴味，最后又同念吾奈因经了多的讨论，直到十月后才正式决定了。”（《伍的誓词》）